生计机会再造：乡村振兴视域下第一代农民工城－乡转场生计重构研究

仇凤仙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第一代农民工日渐步入老年，伴随着年龄增长，他们面临劳动力流失，劳动技能更迭迟缓的问题，其生计模式也由以往主要依靠从事重体力劳动获取生活资料，转变为以适度劳动为主的生计方式。第一代农民工所依赖的以劳动力为关键生计来源的生计模式正面临着城市生计机会减少等外部推力因素，其生计系统呈现出社会－个体双重脆弱性。第一代农民工正处于生计转型的关键阶段，亟待解决生计重构这一现实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自身劳动力流失等因素的影响，其日常生活场域逐渐从城市向乡村社会转移。在此过程中，为提升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可持续性，其生计支持体系的重构需要在要素支持、空间保障、乡村生活机会等方面给予倾斜性保障，并通过上述保障措施实现第一代农民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关键词：第一代农民工；乡村振兴；生计机会；社会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5)04－0107－10

一、引言

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历程和视角取向上一直对农民生计系统进行持续性探索。从历史发展和实践探索历程看，中国农民维持其生计系统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立足于乡村社会建设，发展乡村产业，聚焦乡村建设，完善农业支持体系，实现生计可持续；另一种是从城市化和工业化着手，推动农民走出乡村，即“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在工业化过程中重构农民的生计系统，以实现农民生计的可持续。但从已有的现实经验看，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农业基础地位遭遇冲击，农民赖以谋生的农业生计体系已难以为继。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在事实上对于农民的定位是资源的贡献者而非城市文明和福利的享受者，故而，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实现农民生计可持续的理想目标，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具有典型代表性。他们在乡村生计不理想情况下入城寻求更多的生计机会，但在城镇工作几十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生计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不得不再次退回乡村，其晚年生计没有跳出传统的农民生计支持体系。对他们而言，更为严峻的是不仅是传统的生计体系难以维继，身处社会转型中的他们同时面临文化滞后的消极后果，他们生计体系中的代际支持体系已然弱化乃至消失。故而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民生计可持续的构建必须跳出既有的二元化思路，其生计系统要立足现实，扎根乡村，充分发挥其农民身份与城市务工身份的优势，实现生计系统可持续。同时，第一代农民工生计问题不仅事关农民工群体，更事关社会发展全局，事关社会公平问题，需全社会合力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以构建民生保障体系、农村生活机会为核心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不仅是解决乡村空巢化、人际关系

收稿日期：2025－03－31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5.04.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SHB045)

作者简介：仇凤仙(1979—)女，安徽泗县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流动人口及老年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农村社会建设。E-mail：qiufengxian@163.com

疏离化及乡村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空间和生计机会的重塑过程,为乡村生活主体——农民提供发展机遇,拓展生计机会,构建乡村生活机会。第一代农民工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和"城归"重要群体毫无疑问也应是乡村振兴的价值主体和重要力量,故而其生计系统应嵌入乡村振兴历史进程。乡村振兴应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可持续生计建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尤其在人力资本的挖掘和使用上,第一代农民工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二、现有研究回顾

(一)农民工研究视角转换及其代际关注

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现象自70年代已经开始,被称之为"外流劳动力",80年代谓之"兼业劳动者"[1],90年代以后则固定称为"农民工"[2]。八十年代中后期涌现的"民工潮"标志着中国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作为第一批大规模外流的农村居民,他们也是学术意义上的第一代农民工。伴随着农村人口代际变迁,农民工群体代际分化日渐显著,这种代际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于自身外出流动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两个方面。王春光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动动机、社会特征和社会属性上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分化,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正式对农民工的群体进行了代际划分[3]。

董延芳等认为与之相对应的第一代农民工也日渐成为农民工研究约定俗成的学术话语[4]。第一代农民工的学术指称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期外出务工的人群,第一代农民工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具备农民的基本特征,有完整的农业生产经验,经历过完整的农业生产过程。在关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行动的本质意义解析上,学界较为一致的结论是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逻辑起点是生存驱动下的"生存—经济"行为。郑杭生、洪大用等学者分析了第一代农民工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自身身份和政策平等的诉求,体现了农民工生计问题研究的综合化取向[5]。目前,学界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关注依然聚焦在生计支持体系建构等方面,体现了农民工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生计视角。在地方政策挤压和技术迭代压力下,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空间和生计机会日渐减少[6]。

对于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家乡永远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城市仅是以务工来谋求经济收入的地域。有学者基于26省的调查数据发现无论城乡差距多大,农民工都倾向于返乡[7]。根据南京农业大学SRT项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得知,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为浓厚的乡土情结,也具有更加明显的返回农村定居的意愿[8]。第一代农民工对农村的认同远高于城市,年老后渴望返乡以叶落归根[9]。

(二)第一代农民工生计机会的概念阐释

"生活机会"概念源于马克斯·伯相关论述,韦伯创造性提出"阶级""尊重"与"支配"概念,这些概念分别指涉了"维持个体生计种种机遇的总和,个体的社会地位与所受尊重",以及个体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的能力[10]。韦伯认为"生活机会"是找到自己生活满意度的概率,他对生活机会最重要的贡献是认识到在选择和机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中,选择对于生活机会的获取起着关键的作用。韦伯曾指出,对于个体而言,生活机会取决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换言之,生活机会由其所处的阶层决定。

费立民在界定"生活机会"概念时,将三者分别阐释为"生计""尊重"与"权利",而生活机会即是这三者的综合体。他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正是其为了拓展生活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主动选择[11]。很多学者认为生计机会取决于市场中生产资源的占有程度、社会系统中权力结构以及个体的阶级身份[12]。在农村人口的流动过程中,主导其流动方向是生计机会的选择。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才,乡村留人核心在于乡村生活主体有无生计机会,胡鹏辉认为乡村社会建设关键在于恢复农村的生计、权利和尊重[13]。

在本研究中,第一代农民工生计机会的阐释主要聚焦在“生计”“能力”“权利”“福利”“风险”等关键词的探讨上。作为最早外出的群体,返乡成为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的必然选择,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寻求到生计机会是其生计可持续的关键所在。在乡村社会中,生计机会的多寡不完全归因于第一代农民工个体自身,而是在制度预设下的身份与福利体系的供给。事实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机会型塑的不仅是农民工个体技能与身份关系,而更多指向了乡村社会中有效机会的供给,乡村振兴核心在于创造更多的有效机会满足乡村人口的生计需求,故而,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转场实质在于乡村社会提供有效机会与福利支持以实现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可持续。

三、第一代农民工城乡转场的生计模式变迁

基于生计考量视角下的第一代农民工返乡问题已经成为乡村社会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伴随着其日常生活的转场,其生计模式也正在经历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乡村社会如何满足这部分群体的生计诉求,并发挥其主体性作用是乡村振兴的应有命题。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代农民工年龄渐长,他们在城镇的生计空间被压缩,生计机会减少,大部分农民工返乡寻求进一步的生计机会。在中国户籍制度尚未发生重大调整背景下,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务工的生命历程时间长达 20 ~ 30 年,但是这些并没有使得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摆脱农民的身份标签,他们暮年之下依然只能选择回归乡村,再完全适应乡村生活。从第一代农民工日常生活城乡转场的现实情景来看,该“生计转场”有多重含义。

(一)叶落归根的乡土情结

费孝通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解释了乡村对于农民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来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伺候庄稼的老农因之像半身插在土里……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14]。故而,乡村、土地才是第一代农民工最终的归属,他们的根依然留在乡村社会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代农民工返乡是叶落归根的传统文化的拉力作用。同时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其家庭的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使然,其外出务工模式以家庭的性别分工作为支撑基础。第一代农民工的根在乡村是因为其家庭依然留在乡村,家庭是他们根的核心所在。作为典型的城乡“两栖人”,第一代农民工从未放弃对土地的依恋和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其对乡村社会的归属感在家庭和生产生活中得以延续。在学术界,认为“城乡农民工两栖人是指已经从事了‘契约性’社会劳动而仍保留着原有制度性身份并徘徊于城乡之间的社会群体”[15]。

(二)城市弱生计支持的推力作用

作为城市边缘群体,农民工多处于城市底层空间,流动性大,就业不稳定,生活压力大[16],城市弱生计支持对农民工返乡产生了较大的推力。第一代农民工劳动力日渐流失,劳动技能迭代迟滞,城市生机来源稀缺。因此返回家乡、回归务农是他们的最终选择。作为具有相关理性选择的农民,其对于自身及生活机会的把握要远比外界的观察清晰得多,正如同舒尔茨提出的经济理性小农一样,他们对于市场很敏感,能够较快接纳新事物,因而也可以较为迅速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17]。事实上,在城镇推力的作用过程中,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系统难以为继,这不仅是源于他们自身劳动能力日渐弱化这一内在因素,更多是受到社会政策设置所引发的城市社会排斥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为了保障建筑工地安全,多省相继出台限制性和排斥性政策以限制不符合社会保障政策的特定群体进入建筑行业,由于第一代农民工留城工作的主要地方就是建筑工地,这些政策规定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第一代农民工留城务工的可能性。

作为城乡双栖群体,第一代农民工一方面保留了乡村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城市中,他们缔结的契约仅限于生产劳动契约,而却没有获得足够的生计保障系统契约保护,故而,作为失去了人力资本的第一代农民工,回归乡村也是被动回归的过程。从经济理性角度而言,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

更愿意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报酬。

(三)健康风险弱应对性下的被迫返乡

在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系统中,年龄和健康资本是重要的生计资本,生计能力中风险应对能力是关键要素。作为群体性弱势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其日常生活重构的过程中,生计系统的风险应对能力显著弱于其他群体,其中健康风险应对能力是其城乡转场的关键性因素。作为3D(Dirty Danger Damage)就业群体,他们的健康呈现弱势的累积,经常面临较多的健康冲击和较大的疾病风险[18]。在农民工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方面,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更容易获得良好的医疗资源[19]。作为依靠劳动力维持生计来源的群体,农民工收入水平与他们的健康水平和年龄呈现反比例下降,据相关研究显示农民工的收入高峰在35岁左右,此后其收入一直下降,而城市居民的收入高峰在45岁,然后缓慢回落。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过早的失去了就业机会和收入能力[20]。第一代农民工在50岁以后在健康风险放大和市场生计风险双重挤压下,其抵抗风险能力弱化,在城镇继续务工的机会进一步减少,故而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被迫返乡。

(四)"不确定性"情形中就业结构调整下的返乡

在当代社会"不确定性"比以往社会更加强烈和普遍,"风险"与"不确定性"塑造了一个模糊的社会空间,形成了意义上的社会,世界的全球化使得社会生活更加复杂与多样化,加速形塑了一个以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为特征全新的"乌卡(VUCA)"社会[21-22]。信息的全球化加速了人类社会的流动性,重构了个体的生活机会和身份认同,加剧了社会经济生活的风险系数和生活的动荡感[23-24]。可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风险和冲击相互交织,科技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这些巨大的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引致了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就业结构发生变动[25],作为国民经济系统中重要经济主体的农民工,同时也是国民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26],他们在"不确定"的状态中所受到的冲击也最多。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就业方式转变,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渠道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生计机会被进一步挤压,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更加弱化。从已有的社会发展经验来看,农民工内部不同群体在"不确定"状态冲击下的风险应对能力也存在群体性差异。其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和劳动技能等个体特征起到显著性影响作用[27]。作为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健康损耗大和劳动技能低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在"不确定"状态中面临的风险最大,他们几乎丧失了抵抗"不确定性"状态风险的能力。在"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结构调整下,返乡已经成为第一代农民工获取生计的唯一选择。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生活已经成为他们未来生计模式必然选择,无论是受乡土拉力因素的影响,还是受城镇推力因素的影响,其生计系统必然面临重构,在此过程中第一代农民工原本就孱弱的生计系统变得而更加脆弱,其生计脆弱性伴随着他们生命历程的再一次转场而更加凸显,与其他群体的生计特征显著区别的是他们的生计系统中社会脆弱性特征尤为突出。

四、转场中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系统脆弱

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的生计风险也具有特殊性,即其生计风险中的社会外生风险远高于自然风险。故而,第一代农民工在生计系统转换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其面临的社会风险,从而导致其生计系统呈现出脆弱性特质。

(一)第一代农民工生计风险的变迁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群体面对的风险源也发生了变迁。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群体面对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外生性",这些风险多以自然灾害形式呈现,具有可观察性和可预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而在当下,农民流动过程中传统的外生性风险影响减弱,而人为政策设计带来的不可预测的风险增强。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基于人类自身活动的需

要,人类内在创造了一系列的规则并逐步以制度和政策形式固化,在此情境下,现代生活中的很多风险成为“被制造出来的风险”[28]。这种被“制造”的风险因为现有设计的制度或政策中有意无意的“缺陷”或是“排斥”,导致部分政策对部分群体失灵,从而使这部分群体被笼罩在上述制造出来的风险之下,所以是社会“内生性”的风险。吉登斯认为当下社会中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就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29]。第一代农民工的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由其进入城市后的就业模式和社会阶层地位所决定的,第一代农民工多聚集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的工作具有劳动强度高、操作机械化、危险性高但收入低且不稳定等特征,这就使得他们所面临的风险结构和风险类型已经与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经济体制下的“自然经济风险”完全不同,他们的风险源是市场化、工业化和阶层化的现代社会结构风险。诚如 Cannon 指出,自然界中没有真正普遍的机会和风险,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不平等的机会和不平等的风险所暴露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果……与解释自然系统相比,辨别人类系统本身如何将人与人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更复杂的关系更为重要[30]。

(二)第一代农民工转场中生计风险的社会性

第一代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受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保险制度、市场规则等制约,所获得的“工资都是生存性工资,仅与维持其基本生活资料价值相当”[31],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收入起伏较大,生计维持体系呈现出脆弱性特质,从动机上而言,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以经济收益为首要目标,以期改善其个体和家人的生活水平,部分农民工甚至想通过这种形式获得在城市居留的机会,改变自身命运。但是,受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样的待遇,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同时作为市场中低端劳动力供给者,其自身人力资本缺乏,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选择性,只能成为被选择群体,从而造成其只能在次级市场就业,且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正是这种不稳定性和缺乏持续性的收入造就农民工生计脆弱性。费利民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机会。集体主义组织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取消使得农村人口的生活机会的范围得以扩大,虽然国家给予了农民的生产机会和生活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又以另外一种形式的社会政策或制度安排对农民的生活机会进行了相关限制[32]。计划经济时代的风险国家承诺或国家保障模式发生了变化,赋予了个体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昭示了风险个体化时代的来临。

(三)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的“社会—个体”双重脆弱性

Cutter. SL 指出,对于特定群体的生计脆弱性研究中,研究者不仅要关注群体外部自然系统造成的不利因素,更要聚焦到该群体的社会性特质,讨论其所具有的高敏感性和所处的社会系统失衡对其生计脆弱性所造成的根源性问题[33]。作为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脆弱性研究在学术界尚没形成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故而对社会脆弱性的解释和探讨视角呈现多元化取向。Galea 等认为社会脆弱性应聚焦那些因社会变迁而导致的易受损的敏感群体,提升其抗逆力水平[34]。在学界,对于社会脆弱性概念的解析实质上是以对特定群体所处社会系统性的解释性理解为关键逻辑,即“暴露在风险区域内的所有人都是脆弱的,但风险对社会每个个体的影响是不均衡的,这取决于不同人群的应对能力,作为脆弱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由于自身特征而缺乏对风险事件的应对能力”[35]。实质上,自然灾害脆弱性的根源是社区定居和发展的原有模式,包括持续的社会秩序、它与情境的日常关系以及更大的历史环境[36]。Morrow 认为社会脆弱性是特定群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导致的结构性问题,灾害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再生产的过程,在实质上,社会脆弱性体现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是社会排斥的产物。故而社会脆弱性包含了两个基本命题:其一是风险的不平等,其二是社会分化。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脆弱性的核心在于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和差异化,从而导致风险分配高度依赖于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资源掌握情况[37]。

第一代农民工社会脆弱性的典型表现体现在遭受社会政策排斥、社会资本匮乏、劳动保护措施缺位、福利保障措施不足,同时第一代农民工薄弱的人力资本条件形塑了其内部个体因素的生

计脆弱性,由于现有的社会政策没有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给予有效的补缺和托底保障,从而使得第一代农民工的个人内在弱势被进一步放大,并与社会性因素互相形塑,造就了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个体双重性的生计脆弱性特征。

综上,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的生计风险与传统社会中农民面临的风险有本质的不同,传统社会中的风险是外生性风险,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具有可衡量、显著性等特点,而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的生计风险则是基于社会发展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者说是在特定政策和制度设计下而造就出来的风险,故而,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生计风险更多源于现有社会政策的排斥性与其所处社会系统内部边缘性位置而引致的生计风险累积,这消解了有效资本存量的优势累积,形成事实上的弱势累积。故而,构建农民工生计可持续的思路也应该聚焦在弱化其社会脆弱性,消解社会排斥,重构其生计资源与生计能力,借助城乡合力,善用两个城乡空间优势,充分挖掘第一代农民工内外生计系统的动力和内在潜力,增强可持续性能力。这需要建构健全的生计要素体系以评估第一代农民工有效应对风险的能力,为可持续生计体系的建构提供科学、有效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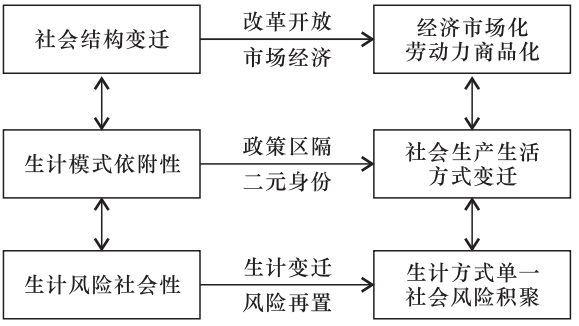


图1 第一代农民工生计风险变迁过程中的社会性因素

五、第一代农民工转场中的生计系统再置

(一)完善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系统要素支持

OStrom. E. 认为,持续创造机会并且能够有效维持以及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是衡量个体或者群体可持续的关键,发展则意味着创造维护机会的过程与结果[38],故而可持续发展可以被界定为个体或群体适应能力和创造机会过程的延续性并且达到预期的目标。纳列什和乔纳森认为建构一个系统化、社会性及外部支持的可持续生计系统是一个长期目标,在此长期目标的指引下,在短期内解决其生计可持续问题是关键。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立足第一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检视其已有的生计资本,充分发挥其生计策略主动性,着眼于增强生计能力三个关键环节,激发生计系统内部的动力,在寻求第一代农民工内在自组织和内在驱动的基础上,实现其生计系统的可持续。

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系统稳定性的关键在于强化外部社会支持系统,外部社会支持系统中核心在于构建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在福利体系,作为外在福利体系的构建以期弱化其社会脆弱性典型特征在外在支持系统上,为其赋能增权减压是关键。如前文所述,社会性因素对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系统的扰动最强,其生计系统稳定性与外在社会政策息息相关。在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体系建构中,构建个体、家庭、社会、国家四位一体的生计动态体系是关键,同时城乡衔接机制完善、内外要素合力是主要抓手。分析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系统可以看出,建构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核心在于弱化其社会脆弱性,构建其生计机会,虽然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各种外在因素退出城市生产领域,但是他们在乡村生产空间内依然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故而在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建构中,依托其内在动力,充分发挥社会政策工具性特征,强化外在社会支持,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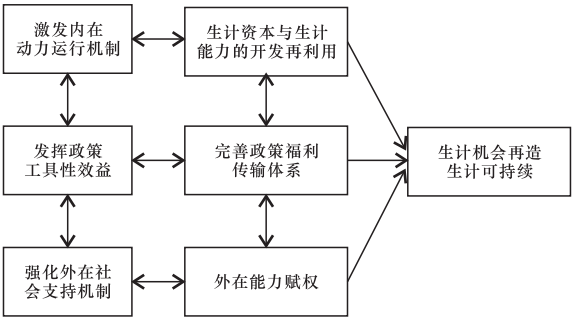


图2 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系统赋权增能路径

乡村社会中再造其生计机会是解决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的关键。

(二)确立农民工乡村振兴中的生活主体地位

在中国社会变迁中,乡村社会的悬置和外生性危机使得乡村社会生活主体虚化[39],乡村建设主体模糊。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作为均衡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重构了乡村生活价值主体和生活主体。乡村振兴既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振兴,也是乡村生活重回乡村社会主体的过程。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在最大程度上激活乡村生活主体——农民的建设热情和其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学者指出当下乡村生活的五种主体分别是 75 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外来的短期农业雇工人员、半工半耕的人群、专职乡村社会的生活和生产者以及返乡农民工群体[40]。前面的几类人群分别是有心无力、有力无心和无根人群,他们在乡村社会建设中难以发挥建设主体作用,唯有在城镇生产中由于生产技能更替而返乡的群体才是乡村社会建设主体,故而乡村振兴的核心主体中兼具能力和意愿的只有返乡农民工群体。他们兼具了城市和乡村社会生活方式,是理想的乡村 - 城市摆渡者。其中,作为已经离开城市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充分挖掘其人力资本,发挥乡村建设主体作用,这既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也是解决第一代农民工生计问题的核心举措。基于安全原因,建设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工作场所,纷纷出台相关文件措施,禁止 60 岁以上男性、50 岁以上女性从事相关工作,这些规定进一步压缩了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空间,几乎断绝了其收入来源渠道。同时由于历史欠账、政策发展滞后以及他们自身经济弱势等因素,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保障资源薄弱,生计资源渠道单一,该群体当下面临着严峻的生计困境问题。故而,解决第一代农民工生计困境的逻辑和维度也应该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提供多元生计机会要远比国家福利视角下的福利单方面供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其自身技能、年龄以及教育背景等处于社会和市场中的劣势地位,在城市务工中生涯中,由于自身技能低下,知识储备不足,他们中大部分人在次级市场就业,以劳动力作为主要交换资源从事重体力劳动,收入相对低下,其自身面临着严重的生计机会稀缺困境。尤其在政策空间收紧和经济发展转型之际,其原本就不多的低端劳动力就业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在此情况下,第一代农民工面临两个重要的选择,其一,选择回乡,在乡村或是家乡寻求生计机会;其二,继续留在城市,寻求所剩不多的生计机会。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来看,第一代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不足,他们几乎都会选择返回家乡养老,同时在关于何时退休的问题上,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都坦言农民没有退休一说,干活干到不能动为止。究其原因,还是为了子代或是自己尽可能的多积攒经济资源,以期获得晚年生活保障。不论农民工留城继续务工或是返乡以期获得其他生计机会,其核心目的均在于获得更好的生计机会和经济报酬。故而,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资源供给和生计机会应该是建构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的核心和关键举措。

(三)城乡合力,空间互构是建构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系统的空间保障

第一代农民工在生产形式上兼具农民和现代工人两种特质,他们既熟悉乡村社会规则,也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乡村社会中的能人,具备在乡村生活和生产的能力。从第一代农民工自身情况和城市发展现实来看,第一代农民工最终无法在城市落户,要回归乡村,故而,拓展乡村社会的空间发展机会和个体生计机会对满足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生计尤显必要,让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既能落地,又能扎根。依托农村现有产业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开拓农村现有产业链,充分发挥第一代农民工对外部环境的熟悉能力,让他们成为农业产品链条的延长者和单一产业发展链条的带动者。同时,他们也是农村社会乡镇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积极投身到乡村服务站建设,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既能解决农村社会服务短板,又能满足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需求,助其实现又工又农,充当家庭发展的代际支持者角色。增强其乡村生计的机会还在于加强农村社会建设,为第一代农民工返回农村、回馈乡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第一代农民工留得下来,扎得下根,有生计有发展有价值。

积极老龄化理论提倡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鼓励其在年老时继续发挥其潜在价值和能力[41]。这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既可以增加自身的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又可以让自己摆脱"老而无用"的身份论,将自身从边缘化的社会环境中挣脱出来。从自身角度而言,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城市化的意图和能力,他们的价值使命在于为子女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在经济上,他们外出务工所得全部用于家庭代际再生产,故而他们无力在城市定居。从城市发展角度而言,城市也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第一代农民工落户以及给予相应的福利支持,在此情形下,当农民工返回乡村时候,他们是巨大的人力资本财富,如何开发和运用这笔巨大的人力资本财富不仅关乎他们的生计,也关乎乡村振兴的后续发展。乡村振兴当下面临最大的困境是人力资本的匮乏,这些有经验、有能力的第一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必然会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四)探索乡村专项建设项目,拓展生计机会

我国已然迈入老龄化社会,在老龄化压力下,延迟退休已成为全社会共识,相应的,社会保障等政策以60岁作为保险年龄限制的改革必然提上议事日程,针对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对60岁年龄一刀切的政策已然不符合中国当今老龄化的现实情况。限制第一代农民工就业,显然不是应对中国老龄化的正确措施。保障第一代农民工生计机会,如果在政策制度源头上没有突破,缺乏社会保障覆盖的高龄农民工的高风险问题会转嫁到用工部门,从而影响他们的用工积极性。在政策设计上,针对第一代农民工工伤保险等保障性政策应适当予以放宽,降低第一代农民工就业门槛,保障其有稳定的生计来源。故而,针对第一代农民工的一刀切式清退政策既不符合当下中国社会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匮乏的现实,也无益于缺乏基本生存保障、正进行自我养老储蓄的高龄农民工群体的生计问题。超过7500万名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生计维持既是当下乡村振兴主题的应有之义,也是国家民生建设的重要方面。

构建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体系,核心在于构建多元的社会福利传送机制。政策层面的稳定持续支持是关键所在,同时,从资产可持续积累的视角出发,开展资产经营也是重要途径。此外,充分发挥第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价值,他们已然成为当下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核心力量。农村可借助精准扶贫的契机,开发专门面向农村老人的特色扶贫项目。国家应设立针对第一代农民工的专项扶持项目,积极挖掘这部分群体的潜力,助力他们实现自身价值,提升生活幸福感。与此同时,国家要出台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制定并实施正向激励措施,促进高龄农民工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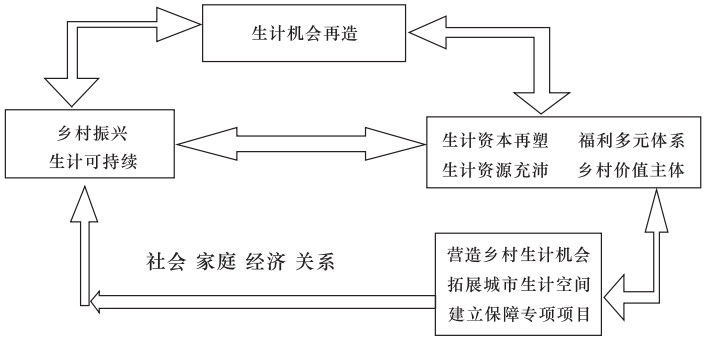


图3 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系统可持续过程

六、结论

第一代农民工核心身份依然是农民身份,他们外出务工的核心目标是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在意愿和实际能力上很少有人可以实现城市移民和改变其现有的社会身份。同时由于他们在外出务工之前已经完成了深度的农村社会化过程,即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外出务工经历并没有改变其镶嵌于血液内的乡土生活习惯。他们作为双栖型人员,家庭在乡村,只身进入城市,老年之后再返回乡村。在生产方式上,他们对于农村社会也是半脱嵌生活状态,他们不仅仅是在年节回家,同时也在农忙季节回家收获庄稼。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相对新生代农民工

而言,他们对于乡村社会有更深的感情,也对乡村的生产方式更加熟悉。当其失去在城市谋生机会后返回乡村时,其面临着生计系统和生计机会再造的过程。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在年龄和知识体系上不占有优势地位,但其外出务工经历和作为城乡生活摆渡者的角色,他们依然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主体,同时作为回归乡村的生活主体,他们的生计系统及其可持续性也是乡村振兴实践过程必须予以考虑的维度,作为为中国现代化历程做出伟大贡献的群体,城市虽然为他们提供了改善生活的契机,但未能构建完备的生计保障体系,则乡村理应承担起相应的历史责任,实现二者的价值互构,营造生计机会,保障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张雨林.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城乡结构—江苏省吴江县四个行政村的调查[J]. 农业经济丛刊,1984(2):32 - 36.

[2]宋林飞. "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J]. 中国社会科学,1995(4):78 - 91.

[3]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2001(3):63 - 76.

[4]董延芳,刘传江,胡铭.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J]. 人口研究,2011(1):65 - 73.

[5]郑杭生,洪大用.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J]. 社会学研究,1996(1):58 - 63.

[6]仇凤仙. 时空断裂与互塑:第一代农民工务工生命历程分析——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视域[J]. 人口与社会,2018(6):68 - 78.

[7]侯江华,李敏. 乡村振兴驱动农民工返乡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 26 省 2332 份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29 - 36.

[8]杨宜勇,张强.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机制与政策研究[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 - 12.

[9]孙文中. 殊途同归: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比较——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68 - 75.

[10]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1]费立民,陆远. 改革时期中国的生活机会:生计,尊重,权利与风险[J]. 中国研究,2008(Z1):169 - 186.

[12]刘志广. 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论我国 "三农"问题及农村税费改革思路[J]. 经济学家,2003(5):42—50.

[13]胡鹏辉,任克强,杜沙沙. 生计,权利和尊重: 生活机会视域下的美丽乡村建设[J]. 中国农村研究,2018(21):134 - 137.

[14]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

[15]陈娟. "失范"与"规范": 社会转型期中国"两栖人"现象及对策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2008(6):50 - 54.

[16]白南生,李靖.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 管理世界,2008(7):70 - 76.

[17]刘祖云,姜姝. "城归":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J]. 农业经济问题,2019(2):43 - 52.

[18]苑会娜. 进城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来自北京市农民工调查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09(5):56 - 66.

[19]柴化敏. 中国城乡居民医疗服务需求与医疗保障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文汇,2013(5):107 - 119.

[20]靳小怡,胡钊源,顾东东. 谁是"高龄"农民工——基于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数据分析[J]. 管理评论,2018(7):271 - 280.

[21]RAMAKRISHNAN R. Leading in a VUCA world[J]. Ushus-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2021(1):89 - 111.

[22]文军. 回到 "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反变[J]. 浙江学刊, 2023(5):15 - 25

[23]许丽萍. 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 - 9.

[24]文军. 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2024(4):13 - 24.

[25]张桂文,吴桐.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20(3):11 - 20.

[26]许光. 习近平新时代劳动力转移思想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18(7):22 - 29.

[27]屈小博,程杰. 新冠肺炎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政策反应[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26 - 133.

[28]孔祥利,师艺文.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流动系统性风险的分析与化解[J]. 学术交流,2021(2):132 - 145.

[29]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 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3.

[30]CANNON T. Vulnerability analysi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natural disasters'[C]//A VARLEY. Disasters,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 Wiley, NewYork, 1994:184.
[31]彭红碧,中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148.
[32]KIPNIS, ANDREW, SUZHI. A Key word Approach[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6(18):295 - 313.
[33]CUTTER SL. The vulnerability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vulnerabilit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3(1):1 - 12.
[34]GALEAS, AHERNJ, KARPATIA. A model of underlying 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 human populations: evidence from variability in population health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11): 2417 - 2430.
[35]黄晓军,黄馨,崔彩兰,杨新. 社会脆弱性概念,分析框架与评价方法[J]. 地理科学发展, 2014(11):1512 - 1525.
[36]HEWITT K. The ideal of calamity in a technocratic age. [C]//K HEWITT. Interpretations of Calami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Human Ecology.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83.
[37]MORROW BH. Identifying and mapping community vulnerability[J]. Disasters, 1999(1):1 - 18.
[38]OSTROM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 - ecological systems[J]. Science, 2009(325): 419 - 422.
[39]张丙宣,华逸婕. 激励结构,内生能力与乡村振兴[J]. 浙江社会科学,2018(5):56 - 63.
[40]曹宗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问题的多维审视[J]. 中州学刊,2021(8):41 - 47.
[41]同春芬,刘嘉同. 积极老龄化研究进程及展望[J]. 老龄科学研究,2017(9):69 - 78.

Reconstruction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Rural Migration Pattern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QIU Feng-xian
(*School of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re gradually entering old age,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issues such as labor loss and slow updating of labor skills. Their livelihood model has shifted from mainly relying on heavy manual labor to obtain subsistence materials to a livelihood approach centered around moderate labor. The livelihood model tha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lied on, which was mainly based on labor as the key source of livelihood, is now facing external push factors such as reduced urban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As a result, their livelihood system exhibits socio-individual dual vulnerabilit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at a critical stage of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nd urgently needs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livelihood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factors such as their own labor force loss, their daily life domains gradually shift from the city to the rural society. During this process, to enha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livelihood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livelihood support system needs to provide preferential guarantees in terms of factor support, spatial security, and rural life opportunities. Through the above guarantee measure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achieve synchronous resonanc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social vulnerability

【责任编辑:杜晓艺】